

三界通达：《符号学诸领域》的新拓展

宋文 朱静芳

摘要：随着当代文化迅速进入“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生产与消费已远远超过物质消费。面对新形势，符号学为纷繁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共通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而以四川大学为重镇，以赵毅衡为核心，以文化—传媒为中心的西部符号学学派的诞生，是符号学在中国90年发展成为显学的明证。赵毅衡提出虚构文本是由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共同构筑的“三界通达”的混杂世界。本论文借用赵毅衡提出的“三界通达”概念，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以此建构文化—媒介—符号的三位一体。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符号学诸领域》正是在此着力，本论文总结了此书对西方符号学诸理论的梳理，融入中国符号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并拓展了理论的应用领域。以符号学视角研究文化和传媒，以高度开放、对话的姿态，融合哲学、语言学和不同媒介文化，目的在于实现现实文化担当，开拓新的符号学领域。

关键词：三界通达 《符号学诸领域》 新拓展

DOI: 10. 13760/b. cnki. csalt. 2015. 0088

—

本书以中国学者对西方符号学诸理论的一系列细致的综述、译介工作开篇。唐小林高屋建瓴，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符号诗学诸领域由形式论符号诗学、结构论符号诗学、模式论符号诗学和解释论符号诗学构成。^①符号诗学为文学意义的方法论。乔琦的《诗歌理论符号学》梳理了中外诗歌符号学理论，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从符号学角度讨论诗歌，提出“标出性、刺点、

^① 唐小林、祝东主编：《符号诸领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本文此后引此书仅随文标注页码。

根据性滑动、阐释漩涡等理论”（335）。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建立在“主型—模式—文本”理论框架上，主型是诗歌的最核心意义单元，模式是主型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338）。雅各布森诗学围绕三点内容：诗的功能说，诗的对等原则说，诗的隐喻和转喻。诗性的核心在于符号的自指性。卡勒构建了结构主义诗学，又参与到解构主义文学活动中，坚持文学本体论的探索。

赵毅衡指出中国80年代的符号学讨论的一大特点是和结构主义混杂在一起，本书的许多论文则梳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转变过程。其中，张碧《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回应。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而取得重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属阿尔都塞，其“结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问题式”等概念上；马舍雷以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对文本进行条分缕析地剖析，由此提出“离心说”；詹姆逊站在历时性的现实维度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传统中的“共时性”维度进行抨击。张艾然指出，“精神分析符号学”体现了符号学科从索绪尔到皮尔斯模式的转变，也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突破的过程。克里斯蒂娃是真正建立精神分析符号学的学者，同时打开了性别符号学研究的新局面。她独创“子宫间”的概念，提出“符号的”女性和“象征的”男性之别。彭佳关注的“民族符号学”早期研究集中在民俗、艺术、神话的某一符号上，体现了结构主义特点。沃伊特引入“文本的”的概念，给这一学科带来真正的增长点，走向了更为开放、广阔的后结构主义体系。

对当今西方符号学理论热点能够准确把握是本文的另一大特点。现代符号学运动包括三大潮流——结构的、现象学的和实用主义的。董明来在《现象学符号学》中指出，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运动，对“自然认识”采取一种悬置态度，寻求无成见的知识，进行意向性研究。海德格尔思考了“符号的存在”，建立了此在的生存论—现象学的研究框架。德里达批评胡塞尔形而上学的“在场性”统治，而忽略了“缺席”与“沉默”的意义。伏飞雄在其《哲学阐释学与符号学》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发动了“阐释学的存在论传向”，主张“语言言说”，伽达默尔“人之理解的语言性”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利科将语言符号还原到“言事传意”之话语交流层面，这在当今符号膨胀至异常工具化的时代，尤有警醒意义。伽达默尔特别指出了当代语言符号的危机：工业化时代拉平了生活方式，导致语言词汇内在生命力的枯竭现象，使语言近似于一种技术符号系统。（88）

本书借鉴西方主体性概念，是对中国文化民族心理构成的一种补充。魏全凤的《存在符号学》揭示了塔拉斯蒂否定与肯定的存在轨迹，发展了萨特虚无的观念；自我和自身区分发展了米德的主我和宾我的概念；自我存在和

为我存在发展了黑格尔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观念，是重建主体的先锋尝试。(99) 罗伯特·威利在《符号自我》中将自我理解为一个充满社会性、对话性及自反性的符号，是一个充满弹性的符号化阐释过程。文一茗从符号学原理梳理自我的种种概念，以探究主体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女性主义符号学论著提出了一些概念，使女性获得了言说主体地位。而菲斯克“自我民族志”探寻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如何利用可用的社会资源创造出一个符号空间，并由此建构出社会成员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311)

除哲学的维度之外，符号学的语言维度值得重视。索绪尔依然受到中国学者的最大推崇，黄晓冬在《语言符号学》中指出索绪尔开创了语言符号理论，即符号二元化任意性结构，区分历时—共时、语言—言语。雅各布森则强烈批评索绪尔的任意性，提出语言组合关系上的“像似性”。黄晓冬还就后学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皮尔斯为核心的符号三分思想对语言研究的启示，对中国语言学界对符号任意性和像似性的论争进行了综述。刘丽《认知符号学》，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马睿在其《电影符号学：西方和中国》中指出，电影符号学奠基者之一艾柯在结构主义之外引入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英国沃伦的《电影中的符号和意义》同样借用皮尔斯的“三分法”把电影符号分为像似、指示和规约三个体系。可以说，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不仅揭示了80年代以来符号学科长期被结构主义所掩盖的状况，也凸显了中国符号学学者从深受索绪尔影响到受皮尔斯符号思想影响日隆的过程。

本书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符号理论发展也有所涉猎。周劲松《伦理符号学》梳理了该名称的出处。新世纪之初由意大利符号学家庞齐奥和佩特里尼在以之为题的专著中正式提出，通过对全球性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维度来凸显人作为“符号活动的动物”，对地球、生命的关怀和责任。(124)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欠缺之处也非常清醒。程丽蓉指出，“性别符号学”成为各类符号系统话语演练和编织的场所，迄今还未有该领域特有的话语和理论出现。胡易容指出，传播“无学”问题由来已久。

唐小林在本书序言中阐明，中国西部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有些理论是中国学者的创见，第一次提出新概念，进行所谓的理论“圈地”。赵毅衡将符号叙述学定义为“广义叙述学，就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讲故事的符号文本的共同规律”。(3) 符号叙述学试图在一般叙述的共性背景下重新理解传统体裁（小说、电影）的特征，同时也为被叙述学与符号学忽略的叙述体裁（新闻、广告、游戏、体育等）提供一个学理化的研究模式。(10) 方芳首次

提出“奇幻符号学”的定义——以奇幻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主要研究奇幻文本意义的产生、传播及接受（40），其核心重在建构一个异世界，营造出这个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产生现实与虚幻之间若即若离的审美张力与快感。（39）

二

赵毅衡回顾中国符号学 90 年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独立提出“符号学”始，以金克木 1983 在《读书》第 5 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为标志，到 80 年代汇成大潮，90 年代后期符号学运动进入新阶段，中国成为符号学大国。赵毅衡提出把数量变成质量，把“中文的符号学”变成“中国符号学”（381）的殷切希望，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理论体系，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建构新的体系。

孟华在《汉字符号学》中大胆预言 21 世纪“中国学术将面临一场汉字转向”，指出“文字间性”是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汉字符号为对象概括出的文字间性理论，整合了索绪尔、巴赫金的“言”，德里达的“文”，皮尔斯的“象”。汉字与图画、抽象记号、实物符号发生高度的关联性。（145）中国文化传统对自然物有着“意象化”情结，让物言志，产生了“物语”的实物符号。祝东对周易、名墨、孔孟、老庄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上述诸家很早就充分运用符号，探索符号与人类表意活动的关系。《周易》作为一个人类早期解释世界的符号系统，以阴阳为基本元素，以高度抽象化的符号组成六十四卦，象征天地万物。孔孟关注的焦点是正名论和礼乐论，都与符号研究相关联。道家、名学和逻辑学相关，而言意之辩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得意忘言”是庄子言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言意之辩的贵言论对中国文化思维习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兰兴在《术数符号学》一文中论及中华民族原初符号四柱禄命，其最基本的五行和干支两组符号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孙金燕《“江湖世界”符号学》勾画出中国侠文化创造的“江湖世界”，多数研究者讨论“江湖”所潜藏的批判现实的乌托邦冲动，即中国社会的民间“江湖”是“法外世界”江湖的符号秩序翻转价值和平衡，惩恶扬善，“以暴制暴”。

语言符号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反映。在老子的观念里，“道”是支配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老子认为人类的贪欲和“名”的发展有关，治理的药方是“无名”，“名”是人们欲望膨胀、社会纷扰的根源，必须去除。（181）老庄的无名思想针对过度追求权力符号的社会现实而提出，

目的是为了消解人类的符号欲望，回归心灵的宁静和自适。佛教对中国思想影响极大，续戒法师《唯识学与符号学》是该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唯识学说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基本理论，“缘起”是其教义中的枢纽，是对语言符号实体化倾向的消解与剥离。

赵毅衡指出，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探索是用符号学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文一茗的专著《〈红楼梦〉叙述中的符号自我》，是用符号学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值得注意的最新尝试。张劲松论刘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古代理论性和系统性最好的文艺评论之书。刘勰规范和确定了“《文心雕龙》符号学”和“历代诗话符号学”，对中国传统诗话研究做了一定的总结工作。古代文论批评话语的符号学系统，构建了古代中国谈艺的“符号结构主义”思维，在儒家礼教尊卑秩序之“道”的规范下，将“文”纳入这个系统。文学依附于儒道，属于肩负载道任务的文化符号之位。在张劲松的《历代诗话符号学》概述中，钱钟书是第一个真正注意到“诗话”符号学的学者，点出诗话最重要的符号文本特质——“轶事类小说”。（196）马建智的《中国诗味论与符号学》论证中国论诗的“体味”心态，阐释古代“滋味”论的发展。90年代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揭示了古代诗话评点与符号学相通之处，论及诗歌的非直接指语“悖论”、语言的“消义化”、比喻的反常组合。张劲松还指出，由欧阳修命名的“诗话”是亲切随便的漫谈杂话，因而少有系统性的宏大叙事，它注重的是类小说叙事的记言录事。（205）

中国符号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汉字的意象思维性质成为汉民族视觉符号的共同表征。（149）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评价的元语言。（173）老庄的无名思想有对现代符号横流的社会弊端的救治作用。史传记事和诸子言谈遗风的结合构成诗话诞生的两个元符号文本。四柱禄命被当作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之一，也满足了最广大民众的文化需要，即需要一种工具来实现趋利避害的朴素理想。通过理解“江湖世界”盗亦有道的符号秩序，而理解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表意符号系统。（233）《周易》采用拟物取象、设卦观象等方法，直窥整个宇宙生命生成的隐秘，其易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元符号，其符号研究重点在于用来占卜的依据和为现实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资源，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用自己的话语系统，探索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独特风貌。而佛教唯识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厘清并转换人的认知模式，使人对“真实”有离开语言层面的观照体验：依于“正智”了解“真如”的认知模式，即通过超越的、不掺入任何语言思维活动的直观智慧完成对真实的体认。（215）

三

本书是对索绪尔语言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强调文化—媒介—符号三位一体。“符号本质上是媒介,文化是符号活动的总集合,就是符号化的媒介文化。”(序3)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符号消费成为当下消费的主要形态,人们消费的是一个故事、一种身份或一种生活方式。始自七八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中,海登·怀特开创用叙述改造历史学的运动,由此开启“叙述转向”这一大潮。叙述转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去考察。这和赵毅衡论述的异化符号消费和广义叙述学的旨趣不谋而合。赵毅衡指出当代社会已进入“以追求符号价值为主的‘异化符号消费’”,只能在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上下功夫。广义叙述学拓展了过去被传统叙述体裁忽略的新闻、广告、游戏、体育等,并提供一个学理化的研究模式,通过学科融合,为理解当代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符号学应用最多的领域是文化与传媒研究。在《传播符号学》中,胡易容指出施拉姆《传播学概论》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胡易容通过梳理传播学经典模型,从伯格纳的总模式到霍尔的编码译码,再到非斯克的话语模式,人们看到了传播学对意义的重视。胡易容在《图像符号学》中揭示了米切尔的“图像转向”,海量图像加上传媒对视觉感知的地位确认,宣告了“新图像时代”的到来。同时艺术已成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表意行为,部分艺术转化为实用性的设计语言。图像符号学正转化为一门“泛视觉文化符号学”(345)。饶广祥在《广告符号学》中指出罗兰·巴爾特的《图像修辞学》是最早研究广告符号学的著作,而比斯利和达内西《说服符号:广告符号学》的目标是对广告作一个系统的符号学分析,在广告的意指方面有系统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告出现“叙述转向”,以受众为核心,更强调创意和娱乐,以讲故事的手法,表达情感。

在广义叙述学的框架下,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体育、时装、品牌都需警惕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冷战后,竞技体育成为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战争隐喻,受到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像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奇观”赛事成为联系全人类的纽带。进入21世纪后,体育符号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魏伟《体育符号学》总结了符号学先驱的体育符号思想,包括巴尔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和艾柯的早期符号学研究。巴尔特《神话学》中的开篇之作《摔跤世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他通过对摔跤手比赛中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和比赛共时系统和聚合轴的分析,让体育符号研究分析有

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和框架。(282) 巴尔特的《流行体系》开启了对时装符号学的最初探讨。衣服作为一种非语言交际手段,具有言说功能,扮演着符号、交际和美学的角色。布尔迪厄提出场域论,进一步提出体育社会学构架,并论及体育和权力、经济的关系。宋颖在《时装符号学》中提醒人们要警惕由广告、媒体、陈列、品牌建构的时尚意识形态。蒋诗萍在《品牌符号学》中援引鲍德里亚商品符号价值理论,认为品牌是市场营销意义的符号,也是商品的社会象征性。因此品牌的功能在于赋予商品符号价值,品牌已成为当今社会拉动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名人文化在中国空前兴盛,名人是人化的符号,引领社会的行为方式与消费潮流。闫文君提出“名人符号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以名人符号的生产与消费为理论提供参照;通过对名人符号的历时性分析,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变迁;通过对名人现象的分析,在理论层面对名人文化进行归纳,推进大众文化的研究。

宗争尝试构建“游戏符号学”的初步构架,为游戏研究领域提供一条可资探索的新路。“游戏美学”是近20年才兴起的一门学科,与电子游戏的诞生和发展同步。宗争列举席勒的“审美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伽达默尔的“艺术游戏论”等研究理论,以凸显当代电子游戏研究的重点问题——游戏叙述问题、超文本与交互性问题、新媒体与赛博空间问题,都与广义上的符号学相关。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揭示了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仍然走的是传统写作的老路,进而和欧美的网络超文本、赛博文本、遍历化文本形成区别。中国网络小说的特点是冗余多、注水多,是具有互动性与快速更新性的一次性表演。(367) 网络小说的传播具有社会政治性,受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谭光辉的《幸福感与符号学》宣称幸福问题就是解决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的问题,是符号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幸福感是主体在符号自我意义被确认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幸福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符号自我”的定位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符号自我”定位是“善”;笛卡尔的定位是“理性”;康德的定位是“德性”;马克思的定位是“社会人”;尼采的定位是“自我本身”;弗洛伊德的幸福与无意识本能欲望相联系,人生目的由享乐原则决定;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发展为爱欲论;萨特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对个人幸福的绝对主宰。幸福感符号研究能够帮助自我重建,对现代人的精神救赎意义重大。(323) 陆正兰以哈贝马斯的“交互行动”为理论,指出流行歌曲的歌者与歌众相互融合,体现了“共同主体性”的实践典型。(349)

综上所述,《符号学诸领域》突破索绪尔的二元语言学模式,吸收了皮尔

斯的符号三分思想,形成语言、文化和传媒互动的多元符号运动,以抵达赵毅衡所说的“三界通达”的混杂世界。本书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综述全面,重在揭示符号学的理论发展脉络,同时将中国符号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凸显中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通过整合孔孟儒家、老庄无名思想、《周易》卦象和江湖“法外世界”,力图揭示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通过借鉴先进的符号自我、“主体世界”等理论成果,重塑灵魂,重建自我,提升中国人的幸福感,以解决当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困境、信仰危机。本书尤其重视符号学在文化研究和传媒领域的应用,在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的框架下进行跨媒介叙事,彰显了符号学这一交叉学科对各种知识的令人惊异的吸收能力和符号强大的言说功能,它必将成为国内符号学后续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一本书。

作者简介:

宋文,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英国现当代文学。

朱静芳,南京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